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3.06.017

由1971—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情况 反思中国文学*

耿 潇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针对当前现状,以1971—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四十年来的获奖情况为研究对象,从获奖作家所属的不同的国家分布、作家性别比例及和获奖作品风格与主旨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发展态势,概括和反思目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剖析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原因,由此提出对于中国作家要在诺贝尔文学奖中占有更多席位需要完善方面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地域分布;性别;风格与主旨;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6-0109-06

每年都有这样一个受到世界瞩目的盛大典礼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这便是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它不仅是对潜心钻研并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的崇高奖励,更是对以个人力量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付出的高度肯定,因此其奖励除了对重要发明的肯定和对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褒奖之外,还有一份对于文学家来说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评选至今,已有一百零四位作家获此殊荣,虽然其他著名奖项如美国的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英国布克奖及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等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奖项以其遴选程序之严格、奖金数额之巨大、延续时间之持久及获奖作家分布地区之广泛,已成为一项最引人瞩目而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奖项。随着诺贝尔奖的不断演进,其跨文化的力度不断增强,特别是从20世纪

下旬始,奖项愈加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开始更冷静地处理欧洲文学与该奖项的关系,也开始愈加关注女性作家,这使诺贝尔文学奖一步步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奖项。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步步走向世界,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也不断走向繁荣,然而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一直榜上无名,直到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点,这无疑是个历史性时刻,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这一刻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个文学底蕴深厚的国家此前为何在诺贝尔文学奖上频频落马,这一次莫言为何能够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打破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零的记录? 本文将通过剖析1971年到2011年四十年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情况,从而反思中国文学现状,并预测其

* [收稿日期]2013-09-14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重点研究项目(XTS10001)“英美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耿潇(1982—),女,河北衡水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研究。

发展方向。

一、获奖作者的国家分布及走向

1971—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分别来自世界不同的29个国家,由此可见获奖分布的广泛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诺贝尔本人的愿望的实现——“颁奖中不考虑受奖人的国籍,无论是否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血统”(出自诺贝尔遗嘱)。然而将40年以来诺贝尔获奖者按洲际划分,却能发现广泛性背后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欧洲中心主义。除2010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因同时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暂不列入统计之外,获奖的作家来自美洲的有8位,来自亚洲的有2位,来自非洲的有4位,来自大洋洲的有1位,来自欧洲的则有26位,显而易见,获奖作家集中分布在欧洲大陆上,而且所占比例高达总数的66.7%。

从1971年至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分布可看出,在四十年的发展变迁中,欧洲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大赢家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也有许多人因此质疑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对欧洲文学的情有独钟和对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的忽视,如《美国书刊评论》的主编Di Leo,通过回顾美国作家的获奖历程,他提出瑞典文学院评奖的“孤立和狭隘”,并提议设立一个更加清晰的奖项来取代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欧洲站在世界文学世界中心”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欧洲包揽了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名额,其次是美洲,之后是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针对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的重心,欧洲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历史沉淀之深厚为其文学发展提供了一方沃土,这也是欧洲得以持续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稳稳站住脚跟的重要因素。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的视野和理念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升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大批希腊的古典著作和优秀思想不断涌现,人们开始反抗封建神学和宗教压制,积极探索人的价值和地位,这些进步思想的传播和发扬对当时的政治、科学、经济及人们的

神学世界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文艺复兴不仅使人们逐渐摆脱传统观念中封闭愚昧的成分,拥有了理性思考的勇气,而且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打破了人们对神学的迷信,为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扫除了障碍。不能否认欧洲一大批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文艺复兴掀起的全民思想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无价瑰宝。而之后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都对20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极大震动,欧洲的文学发展也因此发生着持续的革新与变化。另一方面是语言优势,欧洲的语言大部分属于印欧语系,其中包含了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挪威语等)与罗曼语族(后演化成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单位所使用的是瑞典语,而英语、德语、挪威语、丹麦语和冰岛语与瑞典语相似度较高。不同的语言文字在词汇、句法、结构、形式和风格上等均有较大的差别,两种语言距离越远,隔阂也就越大。因此文化上存在的较高的共通性无疑是欧洲的一大优势,它无须译者对作品大范围的诠释乃至重新创造,对于诺贝尔奖评定单位来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会更加顺畅而自然,因而更能引起文化共鸣,这是欧洲独占鳌头的另一重要原因,或许也是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中承认评奖委员会历史中存在一些疏漏的原因^①。

再来看看亚洲。作为承载了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传统的亚洲不但没能在诺贝尔奖中独占鳌头,反而屡屡落选,亚洲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领域中一直以来也没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且这一局面也并没有随亚洲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崛起和蓬勃发展得到明显改善。从1971至2011年以来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仅有来自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和大江健三郎(1994年),而中国至2012年以前都未能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其个中原因是值得商讨的:

第一,诺贝尔奖的评价标准与思想倾向。纵

① 关于谢尔·埃斯普马克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详见其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观诺贝尔文学奖历届公布的获奖陈词中可以发现,早期的获奖者多因“文字细腻”“描写生动”“开创新的写作手法”等理由而获奖,瑞典文学院推崇独立的价值观,倡导文学作品“不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农民作家”之称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也能获得评委青睐的原因。然而对于亚洲这样一个历史上动荡和变革较多的大洲,保证其独立和不受政治干扰的难度显然是十分大的。相反亚洲作家十分注重在作品中描写相关社会背景等,这成为亚洲作品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第二,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地区差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者大多是瑞典人,文学的对外交流和语言特点的不同都可能对评奖产生一定的影响,亚洲的文学很繁荣,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上与欧洲文化所存在的固有隔阂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对来自亚洲的作家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正是囿于文化的差异,亚洲的文学作品在被送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处细细考究之前都已经过翻译甚至重组,特定语言的精髓所在也会因此不可避免地流失。

二、获奖作家性别比的差异及变化

除了洲际之间的差异性之外,纵观1971—2011年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还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那也就是获奖作家的性别比。获奖作家在性别比例上眼中失衡,其中男性作家有34位,而女性作家只有6位,女性作家在获奖的频度和总数上与男性作家之间差距极大;另外还可发现女性作家的获奖都是出现在1990年以后,而之前则基本上是由男性作家包揽这一奖项:

这一长久以来的现象令人不禁思考,在男权主义社会中女性作家所受到的压制和埋没。在漫长的父权制统治的历史时期,女性的生活范围局限于家庭,而在这样性别分工的理念下,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却是考量谁创造了社会价值,这一标准直接导致女性的地位和价值难以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并不完全同步,且文化

思想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沉淀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传统性别观念,让女性与“家”始终存在着如影随形的联系,这一家庭观念无形地束缚着女性的发展,影响着女性地位的全面提高,这也是全世界女性作家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令人欣喜的一面,即自1991年开始,女性作家获奖的频度有了较大的提升,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原本处于劣势的地位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提高。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于19世纪,它的发起与女权运用有着紧密联系。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女权运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并且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极大的延展空间。在文学领域,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情高涨,大批优秀的作品开始涌现出来。进入二十世纪,女性的权益日益受到重视,女性作家的作品因而也得到进一步传播,且其特质愈发突显:在注重人文关怀之余,更重于表现女性对世界的思考与探索。

从女性作家地位日渐上升这一现象,我们也能发掘出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焦点的变化和扩充。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创作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男性作家更关注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女性作家则更侧重于从女性独有的视角和关注层面出发,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及外部环境对这一世界的影响,如1991年获奖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和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获得者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被誉为“女权主义宣言”,它不仅是对女性自身的探索,也以广阔的胸襟面向了女性之外的世界。2009年获奖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更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瑞典学院评奖词)及复杂社会中人性受到的践踏和轻视。

不能否认,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开始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也日益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源于女性作家凭借自身那份与生俱来的细腻与敏锐的观察力,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她们能将对生活的思考与文学结合,从而创作出更为贴近社会人心的优秀作品,这是其优势所

在。另一方面,她们对事物的感觉更具体、灵活,且往往感性高于理性,因此在创作时女性作家更为注重细节的刻画与描绘,将对社会的感触融入生活,再将生活的特质所在以个体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且将对个体的刻画予以细腻描摹,从而使社会这一大命题于读者面前变得亲切可感、真实清晰。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女性作家的日渐关注,也折射出了这一奖项对于当代多元文化、对于外部世界和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的关注。

三、获奖作品主旨与特色

法国作家布封曾说过:“风格即人”,文学风格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既涉及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言语形式,也与一定的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在1971—2011年这一段历史时期,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且各国作家的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地域、民族等特色,但所有获奖作品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调,即对现实世界的发掘和对社会伦常状况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如197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 1973)。这部小说以病床为中心线索展开,在描写围绕钱财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中,作者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精神和情感危机,进而探索生存价值和人生追求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以对现实世界的发掘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现状的揭露与批判为主题的作品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主流,对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宗教信仰也因此受到不断地挑战,加上之前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的巨大冲击,思想积极活跃的知识分子们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伦理体系的信任开始产生动摇,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在思想层面受到影响,从而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漏洞所在,并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二,从科技与文化因素上来看,20世纪初,现代物理学尤其是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物质宇宙观,而随之诞生的电子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更是进一步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甚至是宇宙的传统认知,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而在哲学领域,尼采、弗洛伊德和亨利·柏格森的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尼采“上帝已死”的观点后来成为存在主义的内核,很多作家也因此受到来自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宏大关系并在作品中予以凸显。第三,从文学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作家们不再囿于传统的浪漫主义对海市蜃楼般的理想世界的空洞求,而是开始另谋出路,通过描写与批判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揭露社会的黑暗,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从而引发人们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的改造愿望。在这些社会因素下,对现实的发掘和对社会伦常状况的揭露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帮助推翻旧的思想、建立新的文学理论的过程,更是成为了相对社会发展而言往往显得滞后的文化思想的一种补充,作为一记警钟从文化层面上阐释当今社会的亟须与匮乏,以一个清醒者的角色通过文字唤醒并提升人们的思考力。

四、中国文学发展应有的理性思考

通过以上对获奖作家的国家分布与走向、获奖作家性别比的分析 and 获奖作品主旨的剖析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1971—2011年这四十年以来,获奖作家仍集中分布在欧洲各国,男性作家仍占绝对优势,但女性作家的地位也正在不断上升和凸显,获奖作品的主题仍着重在社会与个人、现实与追求这两个落脚点上,重视思想性,以人道为主线,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曾这样评论当代中国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了市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中国的文学发展到底要做哪些自我反省和思考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中国文学在发展立足点上的偏差。

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每个国家、地区的文学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概念,从而与他国文学区别开来,然而当代中国文学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要提到的是中国作家日渐形成的“诺贝尔情结”。有学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西方文学的经典范例,提供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话语基础。西方文学的许多重要的部分乃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介绍为中国写作所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乃是普遍性经典的确认,也是西方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标准的证明。于是,对西方文学的重要作家的作品的学习和模仿也成为一种风气”,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学界所存在的这种风气让当代的中国文学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难以独立发展。

第二,中国文学题材的禁区太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肯定会有其尊严和禁令,关于国家档案机密、军事机密,统计、技术机密一类的主题文学作品往往是不可以涉猎的,但除此之外,文学题材应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歌颂、批判、讽刺、揭露和调侃的主动权是在作家的手中的。然而建国以来我们在文学领域上划定了太多的禁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旋律是歌颂,揭露的往往也只是旧社会的黑暗,学术上的争论可能引发政治批斗,个人观点可能被打上反动的旗号;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创作的空间拓宽,因而出现了各种流派,文学开始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国作家们的作品却大多回避社会敏感题材,再加上作家们的勇敢揭露甚至可能遭到批斗和打压(如作家慕容雪村的遭遇),中国作家作品中的自我意识和社会价值大大地降低了。

第三,中国文学发展逐步倾向于商业化和功利化。中国作家在视野越来越开阔的同时,文学的纯粹性也不断降低,写作出发点更多地考虑读者的认同度、出版发行和是否顺应潮流,而这些都极大地破坏了作家在精神层面对作品所反映的主旨的挖掘、深入、剖析和表达。中国作家在处理作品深度拉伸和题材拓展之间关系的矛盾一直存在,作家们倾向于在了解群众需求的基础上扩展

题材范围,然而过度的迎合大众品味和文学的商业化趋向又导致了作品难以在深度上有更多的突破,与此同时文学题材的急剧扩展与文学评价体系尚未完善这一现实也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再加上主流价值观欠缺等问题,这些无一不导致了中国文学的走向和独特性所在具有不稳定和不明晰的特点。

市场经济语境下,现代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以数字化信息通讯科技为基点的时代——新媒介时代。新媒介不仅改变着人类的交流方式,也改变着文学的创作方式。现如今,网络作为文学新载体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微博、QQ空间作为自己创作的载体,网上的作品和印刷作品一样能够自由保存、阅读,甚至能够将音频、动画穿插于其中,丰富读者的感官。以中国的网络文学为例,虽然一方面为市场所左右快餐文学大量出现,甚至有部分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其又给予了作家们展现自己思想的全新舞台,在这里作者可以与其作品的读者毫无障碍的交流,交流的过程反过来又显著地影响和改变了作家自身的思想和观点。另外,对新媒介的展示也成为作家创作的主题,电视、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介出现在文学世界里,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境界。从这个层面而言,当前新媒介的传播与发展成为中国文学走出目前这种困难局面的有力支撑。

当然,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也不容小看。中国当代作家陈忠实、路遥、余华等都为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中国当代六十年的巅峰之作”,它深刻揭示了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浑历史。出身于农村的作家路遥始终相信自己有着农民的血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令我们为之感动和鼓舞。另外,路遥创造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写作策略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变迁历程。作为中国“先锋派”代表作家的余华一直以揭示人性丑陋、阴暗和暴力的一面。作品《活着》中,夕阳下的福贵对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仅剩下的朋友老牛细说辛酸一生的情

景,让我们彻底地品尝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国作家莫言能够最终摘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无疑是对中国文学进步的巨大肯定。作为山东人的莫言在作品中当然逃不开对山东各地风土人情的描述。他的作品充满着“怀乡”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并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创造出一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故事,作品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莫言更是一举摘得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委员会在宣布莫言获奖时说:“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因为他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一方面在于其作品因独特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美学价值之外,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变化与价值取向,所彰显的社会态势与发展潮流,所揭露的社会问题与弊端,还有作品带给人们的思考和借鉴意义,这才是其作品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学这些年发展的肯定,也是将中

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最有力的一步。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方面要求社会为其提供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为社会问题的暴露与及时解决提供一条有效的渠道,另一方面作家们要积极反思,独立思考,将思想魅力灌输到作品之中。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应从纯粹出发,感受文学之美的魅力,并品味文学作品的思想精髓之所在,通过文字的纽带了解到社会的不同角落与方方面面以及个体的不同生命轨迹,这才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Di Leo, Jeffrey R. *The Big Dialogu* [J]. *American Book Review* 30.1 (2008):8.
- [2] 谢尔·埃斯普马克. 诺贝尔文学奖内幕[M]. 李之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 [3] 张颐武. 宏愿与幽梦: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J]. *外国文学*,1997(5):10-11.
- [4] 邓阿宁. 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文体叙述特征和叙述模式的嬗变[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责任编辑:朱德东)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Survey on Nobel Prize Awarding in Literature from 1971 to 2011

GENG X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bei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y making a study of the Nobel Prize winning in literature during 40 years from 1971 to 2011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ward-winners, their sex and their works style as well as the motif of the work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t also aims to reflect the status quo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ocate the reas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 Mo Yan's first success to win the prize. Furthermore, the view about how the Chinese writers attempt to occupy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circle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ex; style and motif; Chinese literature